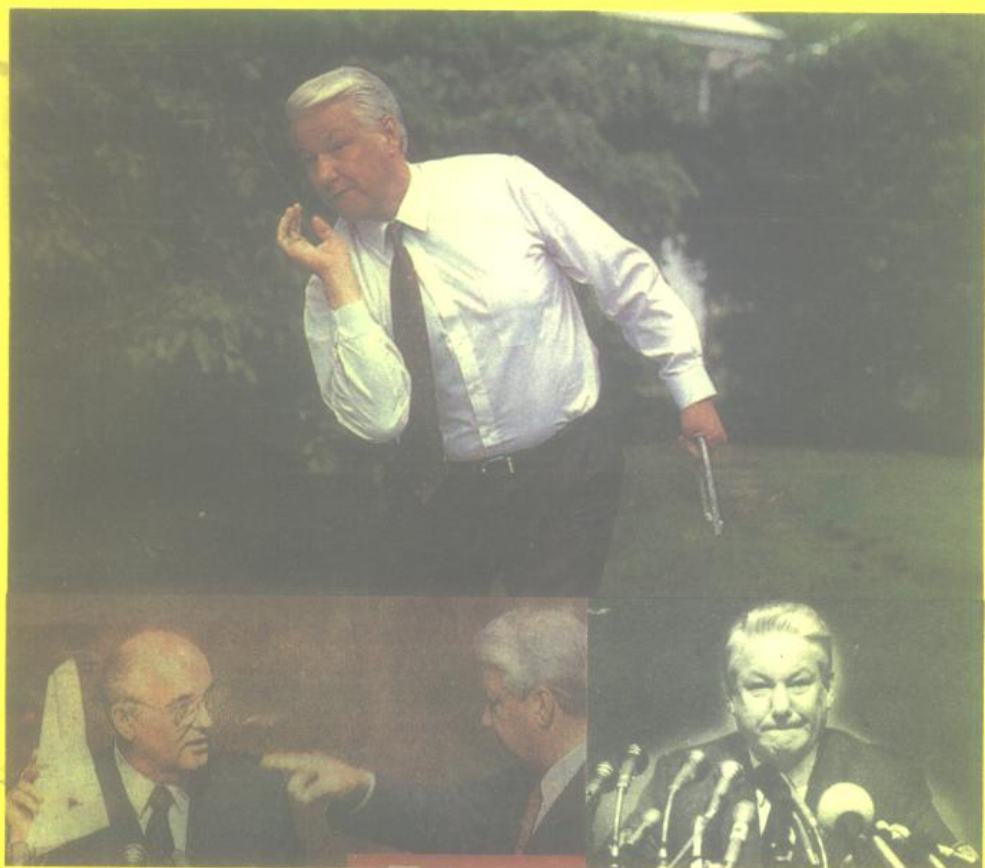




刘毅政 编



叶利钦其人其事

叶利钦其人其事

刘毅政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 周兴泉

封面设计: 尚永强

叶利钦其人其事

刘毅政 编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编码 100072 电话 441531

经 销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蒙文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插页:2 212千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册

ISBN 7-5004-1281-9/D·111 定价:5.60元

编 者 的 话

鲍利斯·叶利钦是近年来苏联政治舞台上出现的又一个风云人物。1991年7月10日就任俄罗斯总统后，他经历了震惊世界的“8·19”事件、苏联解体和戈尔巴乔夫下台等重大事件，他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过程中，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今后俄罗斯国家的走向，国内局势的变化以及他所推行的国内外政策将给俄罗斯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何样影响，已使他成为国内外政界关注的焦点。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叶利钦这个当代历史人物及其在国际风云中的某些活动，本书以翔实的资料和不同的角度，对叶利钦其人其事作了简略介绍和评述。

本书是一本资料性汇编，主要内容均注明出处，供研究者和广大读者参考。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1992年12月30日

目 录

第一章 自 述	(1)
一、童年时代	(1)
二、中小学十年	(5)
三、大学生生活	(12)
第二章 在步入政坛的岁月里	(21)
一、叶利钦的简历和政治主张	(21)
二、政治舞台上的风雨春秋	(24)
三、荣登俄罗斯总统的宝座	(30)
第三章 叶利钦与“八月事件”	(35)
一、“八月事件”的发生	(35)
二、叶利钦平息“八月事件”的经过	(44)
三、“八月事件”后的苏联政局	(109)
四、苏联“八·一九”事件一周年追踪	(116)
第四章 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政策	(145)
一、叶利钦的“经济改革”纲领	(145)
二、叶利钦的“极权统治”政策	(156)
三、叶利钦组建“独联体”的活动	(167)
四、叶利钦对苏共和俄共的政策	(183)
第五章 叶利钦出访的外交活动	(192)
一、俄罗斯政府的对外政策	(192)

二、叶利钦的美国之行	(196)
三、叶利钦与西方七国首脑会晤	(201)
四、叶利钦的德国之行	(203)
五、叶利钦的法国之行	(206)
六、叶利钦访问英国之行	(209)
七、叶利钦首访亚洲的韩国之行	(214)
八、叶利钦访问中国之行	(217)

附录:

一、鲍利斯·叶利钦的言论与活动大事记 (1989.5—1991.12)	(237)
二、俄罗斯联邦简介	(313)

第一章 自 述

一、童年时代

1931年2月1日，我出生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达里茨基区的布特卡村。我祖祖辈辈都住在这个村里。他们耕田、播种，像许多其他人那样活着。

父亲就是在这儿和我母亲结婚的。当时，村里有叶利钦姓氏家族和斯大雷金姓氏家族，这是我母亲的姓。他们结婚后不久，我就很快降生到了这个世界上。

我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母亲对我说过我受洗礼的故事。我出生时，几个村才一个教堂。教堂里有一名神父，而洗礼一个月才举行一次，因此，洗礼这一天神父总是忙得不亦乐乎：有父母、有婴儿、有看热闹的，简直是人山人海。洗礼方法非常简单。将婴儿先从头到脚放入一个装有圣洁液体，其实就是水，和其它伴料的木桶中，然后将水中伊呀乱叫、扑腾乱打的小孩从水里捞出，并进行洗礼，取个名字，并写入教堂的记名册中。这一切做完后，父母们一般给神父端来一杯自己酿造的啤酒和烈性酒……每家人招待得各不一样。

轮到我受洗礼时，已经下午。这时，神父已经累得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的母亲名叫克拉乌娣娅·瓦西里耶夫娜，父亲名叫尼古拉·伊格那季耶维奇。他们把我递给神父。神父将我放入桶中，却忘了捞出，把我抛到一边，就自顾自地开始同别人聊天并争执起来……父母亲先没明白过来是怎么

回事。等明白过来时，母亲尖叫着奔过来，一把将我从桶底中捞起。大家开始七手八脚地将我摇过来、晃过去……我并不是说，这件事情使我对宗教形成了某种特定的看法，不，并不是这样。但我这件惹人发笑的遭遇的确是确有其事。此事发生后，我的父亲倒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他说，既然我们的儿子经受住了这种考验，那就让他叫“鲍里斯”这个最坚强的名字吧！就这样，我从此就成了“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

我的童年过得非常艰苦。没有吃的，庄稼收成特别低。所有人都会被赶入集体农庄：当时对所有人都实行没收富农财产的政策。土匪经常出没，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枪声、到处是抢劫和杀人。

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苦。一间小破屋、一头奶牛。本来还有一匹马，但很快就死了。这样，我们失去了所有耕地用的工具，只好加入了集体农庄。1935年，我们家的奶牛也死了，生活更加艰难。我的爷爷当时已经60岁，他开始到处为别人砌炉灶。爷爷是个庄稼汉，还会木工活，总之，是个多面手。

父亲为了生计，决定去建筑工地。这个时期正好是所谓的“工业化时期。”爸爸知道，离我们家不远的彼尔姆州有一个别列兹涅科夫斯基钾建筑工地，那儿需要工人。许多人都往那儿。于是，我们将剩余的东西装上牛车，赶着车往离家有32公里远的车站走去。

我们来到别辽兹尼基。父亲被招到工地做了一名工人。我们被安置到工地的工棚里。这工棚在当时是非常典型的，现在在一些地方还有。工棚用木板钉成，有一条共用的走廊

连接20个房间，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的舒适。上厕所和取水都得上大街……

我们也发了一点东西，有了一头奶羊。当时，我又有了一个弟弟和妹妹。这样，我们全家共六口人，外加一头奶羊。大家全部睡在地上，你靠着我，我挨着你。从6岁起，我就开始做家务活。既要照顾弟妹，一边晃动摇篮，一边还得看管弟弟，不让他去调皮捣蛋；又要做家务活：煮土豆、洗碗筷、挑水……。

母亲从小就学会了缝纫，她是裁缝。她的脾气温顺、善良。不论是谁，她都肯帮忙。她给人做连衣裙，既帮家里，又帮邻里。天一黑下来，她就拿起了针线，开始缝缝补补。母亲做活从来不收费，只是别人有时给点面包，或别的吃的东西，她这样就已经感激不尽。而父亲的性格却像鞭炮一样，一点就着，跟爷爷的脾气一样。也许，这个脾气也传给了我。

渐渐地，父母间因我的事情发生了争执。父亲主要的教育手段就是皮带。我一做错什么事，他就将我猛揍一顿。不管谁出了什么事，比如，邻居家苹果树上的苹果被人抢了，或者，学校里教德语女教师受了别人的欺侮，他总是想到我的头上，总是不问青红皂白就拿过皮带。我挨打时从来都是一声不吭。只是母亲不让。她总是哭喊着跑过来，不让他动手。而父亲却把门“砰”的一关，闷声吼道：“躺下”。我脱掉了衣服趴着，父亲每次瞄的地方，应该说，还是很准的。我这时总是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这更使他火冒三丈。母亲却总是能想法钻进门来，从父亲的手中夺过皮带，一把推开他，并站在我们俩人的中间。母亲永远是我的保护人。

父亲总喜欢搞点发明。比如，他就曾经盼望着想要搞一台制动做砖机，他画好了草图、一边想，一边改，就这样边想边画。发明这种制动做砖机是亲父梦寐以求的愿望。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人发明出这种机器，尽管许多的研究所现在都在研究这个问题。这令人遗憾。父亲一一给我讲述这种做砖机及其工作原理，说它能砌砖、和泥、并且能移动自如。父亲脑子里全都思考成熟，总的图样也想好了，但由于用料的金属问题解决不了因而他的这一希望就这样化为泡影。

父亲死时才72岁。可我所有的祖辈们都活过了90岁。我母亲现在已83高龄，她同我的弟弟住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弟弟在那儿的工地当工人。

就这样，我们在工棚里住了9年。说来奇怪，工棚里的条件虽然各方面都不好，但人们在这儿生活得却很和睦。当时，人们还不了解“隔音”是怎么回事，并且也没有什么隔音一说。这样，如果工棚的哪一个房间传出欢快的声音，比如庆祝命名日、举行婚礼、或者搞点什么别的庆祝活动，摇起老式的唱机，各家都能听见。当时，全工棚仅有2—3张唱片，我记得有一张唱片当时曾传遍了我们工棚。这张唱片好像叫“肖尔斯走在红旗下，团长……”。如果哪家吵架、说话、发生点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有点什么秘密、发出笑声，全工棚都能听见，也都知道。

我之所以如此厌恶这些工棚，是因为我们当时在里面过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特别是冬天，当我们被严寒逼得无处可藏，没有衣服时，我们就只好靠那只奶羊来取点温暖。我记得，我们那时紧紧地贴着羊的身子，她是那么的温暖，就像是一只小火炉。靠着这只羊，我们才顺利地度过了战争年代。

羊的奶很稠，虽然每天不过才下1公升，但是，也足够我们几个孩子吃的了，因而，我们也就活了过来。

我们那时也挣点钱。每到夏天，我和母亲就去邻近的集体农庄干活。我们一夏天可以收好几公顷的大葱。此外，我们还割青草、堆垛、打干草。打来的一半归农庄，一半归自己。我们将自己那半卖了，能卖得100—150卢布，有时200卢布，然后用这点钱去买点面包。

我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谈不上什么快乐、更谈不上有什么口福，吃什么点心糖食或者是美味佳肴。那时，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想个什么办法活下去。

二、中小学十年

我进入了学堂。我以自己的积极精神和果敢刚毅在同学们中崭露头角。从一年级开始直到毕业，我上的学校都不一样，但我每次都是当班长。我的学习成绩不错，全是5分。但品行却没什么值得好炫耀的，曾经不止一次地差点被学校开除。

在整个上学期间，我总是喜欢出点馊主意，出点鬼点子。比如，在我上五年级时，一次，我们大家从学校二楼的办公室一齐跳了下来。班主任老师走进教室，我们大家都不喜欢她。她见教室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于是，她揪住值日的学生。可那位学生告诉她，谁也没有出去。当时，学校旁边有一小个窝棚，我们在那儿背靠背坐着，互相之间开始讲起故事。听完故事后，我们回到学校。每个人都为此得了0分。只见老师从杂志上顺手撕下一张纸，从上到下给每个人

都划了一个0分。我们自然不服气，说，如果老师要追究我们的品行，那您尽可以责罚我们。但如要问功课，那我们都记住了。校长来到我们的教室，反复地考问大家，问了1、2个小时。但我们一个个都背得滚瓜烂熟。不管叫到谁，谁都能回答出来。甚至那些平时学习不好的同学也是如此。学校没有办法，只好将我们的0分一笔钩销了，可在品行一栏还是给我们打了2分。有时候，我们的行为又跟“小流氓”似的。我们当时仇恨德国鬼子，可还得学德语。因此，我们常常嘲弄我们的德语女老师。后来，当我长大成人后，我想起当年的行为，还不由得感到羞愧，因为这个老师很好，很聪明，又有学问。而我们那时却使她受够了折磨，饱尝了我们男孩对德语抗议的行为。比如，我们将留声机的唱头插入椅子，这样初看上去，是不易发现的。这些针头一根根矗在椅子上。老师刚挨着椅子，便即刻发出“唉哟、唉哟”的尖叫声。不过我们在放针头时也注意不要将针头露的太长，但不管怎样，那毕竟还是针啊，坐上去能不叫疼吗。当然，这次又闯了祸，教委会、家长等又接踵而来。

我们还干过这样的恶作剧。我们那儿有一条小河，叫“兹良卡”河。每当春汛时，河水暴涨，小河变成了大河。人们于是开始在河上漂木。我们发明了一个游戏。看谁能从漂流的木头上从河的这面跳到对岸。漂流的木头一根靠着一根，如果踩准了，还是可以从上面跑到河对岸的。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技巧。当人刚一站上木头时，木头就开始乱滚起来，动作稍微一慢，你就会失脚翻入水中。要靠灵巧从一根木头跳上另一根木头，要懂平衡，靠迅速跑跳。在这过程中，只要稍有不慎，你就会落入冰凉的水中。此时，河面上漂着一片

木头。想要将头从这片木头中伸出水面，那是难上加难。最后，当你终于探出头来，猛吸一口气时，你简直连自己都不相信已经逃离了死神的掌心。瞧，我们那时玩的游戏是多么的惊心动魄啊！

我们还常常打群架，每群60到100人。我总是喜欢加入这些群架中去。有时候我也挨别人揍。你想，当两群人纠缠在一起时，你哪怕有天大的本事，强壮如牛，你身上还是免不了要落上几拳。我是个“塌鼻梁”，跟拳击手一样，那就是当年打群架时被一个细高个给揍的。当时，我躺倒在地，想，这下完了，眼前一片黑暗。但后来，我又醒了过来。人们把我抬回了家里。但尽管如此，打死人的事还是没有过的。虽然我们打斗时都很不留情，但还是有一些分寸。准确地说，这些殴斗就像体育中的比赛一样，只不过条件更加残酷些。

有一次我终于被学校开除了。那是我七年级毕业时。毕业典礼上来了许多人，有父母、老师和学生。所有人的情绪都愉快和高昂。一个个毕业生在隆重的气氛中接过毕业证书。一切与往常一样……。忽然，我站起来要求发言。这情形就跟我在苏共中央十中全会上一样。人们都以为，我肯定会说一番感谢的话，或者说些类似的东西。因为，我考试成绩非常好，证书上全都是5分。因此，人们毫不犹豫地让我发了言。我自然也感谢了那些确实在生活中帮助过我们、培养我们学会思考和教我们怎样学习的老师。说完后，我忽然对大家说：“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无权做孩子们的老师，并教育他们。她简直是在摧残孩子。”

我们的这位班主任老师简直糟糕透顶。她会用长长的教鞭抽打你，会让你站在墙脚罚站，会在姑娘的面前污辱小伙

子，相反，也会在小伙子面前伤害姑娘的自尊心，她还会强迫学生去帮她打扫房间。她曾经下令让学生们在全区里到处为她养的小猪寻找吃食。她还干过其他一些过火行为。我当然难以忍受她的这种行为。同学们也不听她的话，但有的人却还是不得不听她的调遣。简而言之，在这次隆重的毕业典礼上，我给大家讲述了她是如何嘲弄学生、怎样伤害学生的尊严、如何不顾后果地污辱别人，而不管别人是否坚强，软弱或者是否是属这两者之间的人。我一边讲，一边举一些典型的事例。就这样，我向我们昔日的班主任老师发起了犀利的进攻。礼堂里大家乱成一团，所有典礼活动都不得不中止。

第二天，我父亲被叫到教委会。他接到通知说，他的儿子不能得到毕业证书，而只能得张“肄业证书。”这“肄业证书”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张白色的小纸片，纸片上方写你上了几年级，下方写你无权在苏联国内的学校升入下一年级。父亲这下子气极了。他像平常一样，不问青红皂白就拿起了皮带。可我这次却生平第一次一把抓住他的手说：“你就到此结束吧。今后，我要自己教育自己。”确实，我此后再也没被他整夜整夜地在屋角罚过站，再也没有挨过他皮带的抽打。

我当然对教委会作出的决定不服气，开始到处奔走呼号，找区委会、市委会。我这才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区委会，市委会经我的努力，成立了专门检查班主任行为的委员会。根据委员会调查结果，这位班主任被开除出了学校。这对她来说，完全是应得的报应。她根本就不能跟孩子们在一起。我最终还是得到了“毕业证书”。证书上满纸都是“5”

但有一个“不及格”，那是因纪律不好得的，因而在

满纸的“5”中这个“不及格”显得赫然醒目。我决定不再回原来的学校，而到了另一个名为“普希金”的学校学习。这个学校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至今回想起来还感到特别亲切和温暖。我上学的那个班非常好，有一位很好的班主任老师，叫安东妮娜·巴甫洛夫娜·霍尼娜。这个学校的学习才是真正的学习呢。

我开始积极地从事体育锻炼。我很快就迷上了排球，不分白天黑夜地玩。我喜欢看着球在我的手中是那么的顺从，也对自己能高高地跳起来救那些险球感到高兴。在玩排球的同时，我也练习滑雪和体操，练田径、十项全能竞赛项目和拳击。我当时真巴不得什么都练练，什么都练好。但最后，排球还是战胜了其他的运动项目。于是，我开始一心一意地练习排球。那时，我整天都与排球在一起。睡觉时，怀里抱着排球；醒来时，手中还拿着排球。一起床就马上去练球，自己跟自己练，一会儿将球在手中托来托去，一会儿又将球击到地上、墙上反弹回来……。我左手缺两个手指，接球时有些困难，于是我就专门练习独特的接球方式，接球时让左手保持特殊的姿式。这样，我打球时同别人都不一样。

我为什么左手缺两个手指呢？我现在就给大家讲述我缺指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同学们都争着奔赴前线，而我们被留了下来。我们在后方造枪、甚至造炮。我和几位伙伴准备设法找些手榴弹来，想拆开看看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钻进教堂，里面有一个军火库。乘着黑夜的掩护，我爬过三重铁丝网。当哨兵走到另一方向时，我用锯条锯开窗上的木条，钻进去拿了两枚带导火线的手榴弹。幸好，我在往回走的路上还很顺利，如果被哨兵发现，他会毫不迟疑地

朝我开枪的。我们来到60公里外的森林里，想把手榴弹拆开。我劝说伙伴们退到离我100米远的地方。然后我将手榴弹放到一块石头上，双腿跪下，举起铁锤，对准手榴弹就一锤砸下去。砸之前，我没有将雷管去掉，我也不懂。这时，只听得一声巨响，我左手的两个手指随着这声巨响也一同不翼而飞。躲在远处的伙伴们幸好安然无恙。在回城的路上我几次晕了过去。等被送到医院时，伤口已开始化脓。经父亲签字，医生给我做了手术，并截掉了残留的手指。回到学校时，我左手缠满了白色的绷带。

每个夏天，我都要想法挣点钱。此外，每当暑假时，我还组织同学们去旅行，并且方式很独特，或者是去寻找某条河的河源，或者去杰涅日金卡缅山以及作类似的旅行。我们背着个大行囊，要走几百公里，在荒无人烟的森林里一住就几个星期。9年级毕业后，一次我们决定去寻找“亚伊瓦”河的源头。我们逆河而上，找了很大时间。我们会看地图，知道这条河的源头在乌拉尔山脉附近。当时，我们随身带的食物很快就吃完了，我们不得不向大森林要吃的。此时，核桃已经成熟，我们还烤蘑菇、吃野果。乌拉尔山的森林很富饶，可吃的东西漫山遍野。我们走了很久。眼前什么路也没有，一片原始森林。有时候，我们遇到猎人住的小茅屋，就在里面过夜。但经常是，我们自己搭个小棚过夜。有时，就干脆露宿。

我们终于找到了源头，这是一注清清的泉水。大家都兴高采烈，开始往回走。我们沿河而下，走了几公里，来到一个村子前。这时，大家累得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将身上所能找到的值钱东西都收集到一起，有背包、衣服、皮带，然后，

我们找到一户人家。我们将这些东西全都交到主人的手里，请求用它们换只小船，一只用木头做的平底小船。换来后，我们一行人乘着这只小船继续沿河而下，走路的劲实在是没有了。河流沿岸的风光十分美丽，就是现在，这些风景仍然还是那般迷人，人类的行为还没有将所有的一切破坏无遗。突然间，我们的船往上漂了起来，并被水流涌到了一座山洞跟前。我们决定停下来看看。

我们走进山洞，顺着洞中的路往前走。忽然，我们面前展现出一片原始森林，原来，我们已走到了森林的深处。前面的路在哪里，我们谁也不清楚，并发现我们已经迷失了方向。船也不知被水流漂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只好在原始森林里艰难地挪动着，走了几乎一个星期。这时，随身带的东西已彻底用光了。并且，我们所经过的是一片沼泽和年头不长的树林，这里可吃的东西和用的水甚至连一滴也找不到。我们只好把沼泽里的烂草和烂泥一起捧进衣服中，然后用手将衣服拧干，水这样就被衣服过滤一遍，得到的水就用来喝。我们就这样一直走，终于走出了树林，看到了那条河流。我们找到了那只小船，并辨清了方向。但由于我们沿途喝的是脏水，因此我在内，都得了“肠伤寒”。高烧烧到40多度，我也发着高烧。但由于我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我觉得有义务保护他们，因此，我硬撑着身子。我将伙伴们抱进船中，将他们放在船板上。自己则咬紧牙让脑袋保持清醒，因为，我还得掌船。船顺流而下。我用仅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用双手捧起河水，将水浇到同学们的脸上。他们一个个都已经晕迷不醒。很快我也支持不住了。神智开始迷糊起来。船行至一座铁路桥附近，我决定将船停住